

中国农民工语言状况的调查研究

盛

林

松 山 大 学
言語文化研究 第33卷第1号 (抜刷)
2013年9月
Matsuyama University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33 No. 1 September 2013

中国农民工语言状况的调查研究

盛 林

一、研究背景¹

“农民工”一词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社会特有的概念，指的是“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² 本文所说的农民工指的是广义的农民工。通俗地说，“农民工”就是以农民的身份从事工人的工作、从农民向工人过渡的群体。农民工又被称为“进城务工人员”。

（一）中国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农民工现象实际上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社会现象。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出现“农民工”现象（198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以来，中国的农民工数量越来越多，其中出现了两次明显的高潮：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出现第一次高潮，进入 21 世纪以后特别是十六大以后出现第二次高潮³。至今农民工仍在大规模地涌入城市。

在这些年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人员是一个急剧增长的特殊群体。根据 2004 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分析，当时外出农民工数量为 1.2 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 2 亿人⁴。而当时

¹ 本文为中国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农民工语言的调查研究”（07YYB004）的成果之一。

²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第 1 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 4 月

³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第 3 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 4 月

⁴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第 4 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 4 月

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 1.2-1.3 亿,按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 600-800 万人计算,还需 20 多年的时间才能消化完⁵。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农民工数量还将保持增长的势头。

农民工在有些城市的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很大。“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外来人口接近或已占到城市常驻(户籍)人口三分之一以上;苏州、杭州等城市外来人口已超过一半以上;深圳、东莞、义乌等城市外来人口分别是常驻(户籍)人口的 4、3.25 和 2.5 倍。”⁶ 农民工在有些行业从业人员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非常高。“根据第 5 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 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 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 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 80%。”⁷ 所以,农民工是城市人口构成和各行各业从业人员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结构特点是:1. 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男性居多;2. 文化素质和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虽有所提高,但整体仍显偏低;3. 主要以自发外出或亲友介绍方式,有组织外出逐年增加;4. 中西部地区为主要输出地,东部地区为主要输入地,半数农民工跨省流动;5. 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并已成为从业人员主体,服务行业逐渐成为吸纳农民工的重要渠道;6. 务工收入呈上升趋势,并成为农村家庭增收的重要来源;7. 外出就业时间延长,举家外出比重增大⁸。

(二) 研究农民工语言的重要意义

农民工为工业发展增强了竞争力,为城市繁荣增加了活力。发展到今天,农民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数量庞大的一支就业大军。无论从其绝对数量来看还是从其在城市人口总数和行业从业人员总数中所占的比率来看,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社会群体。而且这个特殊群体的语言情况有其独特性,有人认为它已形成独特的言语社区⁹,是值得我们从事社会语言学角

⁵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第 63 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 4 月

⁶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第 319 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 4 月

⁷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第 7 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 4 月

⁸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第 71-77 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 4 月

⁹ 王玲《农民工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的关系及机制分析》,《北华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度进行深入研究的。

另一方面,农民工从农村走进城市,从家乡走向他乡,要想真正融入打工地的城市社会,使他们的城市生活不处于一种“孤岛化”的状态,他们必将面临很多问题,因为其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社会、文化、观念、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语言就是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之一。很多农民工是从一个封闭的、单一的家乡话环境中进入到一个由家乡话、普通话、打工地方言、其他外地方言乃至外语构成的纷繁复杂的多语环境中,他们面临着语言学习、语言转换、语言适应的问题,他们或许因为普通话不熟练、不懂打工地方言、不熟悉新词新语、不懂城市言语交流技巧等因素而产生语言障碍、从而影响沟通和交际,影响就业和收入,因此产生心理压力,影响到他们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影响到他们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本课题主要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沟通、语言认同问题。研究目标是描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语言现状、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语言竞争力以及存在的语言问题;以农民工为代表研究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语言问题及其对策,为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公众交际、社会整合等问题提供参考,也为制定语言政策、进行语言规划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及调查样本基本情况分析

(一) 研究方法

本文资料的搜集采用问卷调查、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的方法。问卷调查的优点是能在大范围调查中迅速获得多方面的信息,但信息容易带有被调查者的主观性。参与观察法具有直接、具体、客观等优点,但必须注意观察的标准化和观察结果的可概括性等问题。调查的时候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相互补充、相互验证,以避免主观和片面,从而比较客观地了解农民工的语言现状。必要的时候,我们还会使用访谈法搜集资料。访谈的目的是针对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疑难问题,选择某些农民工,围绕该问题与他们对谈。主要采用一对一的访谈,

或者在农民工聚会聊天的场所，研究者引出话题，让农民工就该问题自由讨论。

我们首先根据想要调查的情况设计问卷，然后选择30个调查对象进行预调查，从预调查的结果发现问卷设计的问题并及时调整问卷，在此基础上再展开正式调查。在农村我们采取挨家走访调查外出打工人员的方式，在城市我们选择农民工集中的地方如车站码头、劳动力市场、民工村等地方进行随机调查。

本文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和Excel 2007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并根据“变项规则分析法”来进行相关因素的分析。

（二）调查样本基本情况的分析

我们在2011.8-2012.8间展开了正式调查。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64份，回收率82%。回收情况不很理想，因为部分回收问卷是废卷。本次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1. 性别

表格1 调查样本性别分布情况表（N=164）

	男	女
样本数（人）	96	68
所占比率（%）	58.54	41.46

从调查样本性别分布数据来看，虽然男性的比率高出女性17.08个百分点，但两者的比率也还是比较接近的。但从我们以往看到的数据来看，男性打工者的比率要远远高出女性打工者，“2004年，农民工中男性所占比率为66%。”¹⁰ 2004年调查数据男性所占百分比高出女性32个百分点，远远超出本次调查两性占比的差距，那么是不是我们的样本性别比例不合适呢？笔者认为是合适的。原因如下：首先，我们的调查是随机的，没有刻意选择调查对象的性别；另外，在进村调查时我们注意到每个家庭外出打工的人员都有男有女，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性别比例相对接近。因此，只能说本次调查样本的性别分布反映了一个新的趋势：女性打工者大量增加，农民工男女比例趋于接近。

¹⁰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第71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4月

2. 年龄

表格 2 调查样本年龄分布表 (N=164)

	16 周岁以下	16-25 周岁	26-35 周岁	36-45 周岁	45 周岁以上
样本数 (人)	0	86	46	19	13
所占比率 (%)	0	52.44	28.05	11.59	7.93

从年龄分布来看：16 周岁以下的样本数（人）为零，也就是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没有出现 16 周岁以下的非法打工者。比率最高的年龄段为 16-25 周岁，占 52.44%；其次是 26-35 周岁，占 28.05%；这两个年龄段的人群相加占 80.49%，占到绝大多数。这次调查样本的年龄分布与农民工整体的年龄分布是接近的，因为据统计，“2004 年，全国农民工中 16-30 岁的占 61%，31-40 岁的占 23%，41 岁以上的占 16%”¹¹ 虽然本次调查的年龄分档标准与 2004 年的调查不同，但年龄分布情况还是接近的。

3. 婚姻状况

表格 3 调查样本婚姻状况分布表 (N=164)

	已婚	未婚
样本数 (人)	74	90
所占比率 (%)	45.12	54.88

从调查样本婚姻状况分布情况来看，虽然未婚者比已婚者的比例高出 9.76 个百分点，但也还是比较接近、差距不大。而其他学者的调查结果却是：未婚和已婚比例基本呈现“三七开”，所占比例分别达到 30.12% 和 69.88%。¹² 但近年的实际情况是：已婚农民工的比例在增加，这是农民工婚姻状况的新变化。

4. 打工年限

表格 4 调查样本打工年限分布表 (N=164)

	2 年以下	2-5 年	5 年以上
样本数 (人)	39	64	61
所占比率 (%)	23.78	39.02	37.20

¹¹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第 4 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 4 月

¹² 朱信凯、陶怀颖《农民工直接问卷调查情况分析》，见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第 112 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 4 月

从调查样本打工年限分布来看,最多的是2-5年,占39.02%;其次是5年以上,占37.20%。两者相加占76.22%,占相当大的比例。也就是说农民工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长期在外打工的,而且根据追踪调查结果,即使是那23.78%打工年限在2年以下的人群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走出校门不到两年因而打工年限不到两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很有可能成为长期打工者。所以,长期在外打工甚至逐渐在外面城市定居是农民工的一大新的特点。

5. 文化程度

表格5 调查样本文化程度分布表(N=164)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含中专)	大专及以上
样本数(人)	18	69	40	37
所占比率(%)	10.98	42.07	24.39	22.56

从调查样本文化程度分布来看:最多的是初中,占42.07%;其次是高中,占24.39%;再其次是大专及以上,占22.56%,最少的是小学及以下,占10.98%。这个数据与关于农民工整体文化程度的数据有些差别:国家统计局农调队2004年的调查数据是“文盲占2%,小学文化程度占16%,初中文化程度占65%,高中文化程度占1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5%。”¹³我们把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民工整体文化程度的数据根据本次调查的分档标准整理一下,并把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得到如下表格:

表格6 本次调查样本文化程度与农民工整体数据比较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含中专)	大专及以上
本次调查样本(%)	10.98	42.07	24.39	22.56
农民工整体(%)	18	65	12+(<5)	<5

显然,虽然两者中居于首位的都是“初中”,但本次调查中“初中”的比率已降低了22.93个百分点,“小学及以下”的比率也降低了7.02个百分点,而高中的比率提高了十多个百分点,另外本次调查中出现了“大专及以上”且比率高达22.56。总之,本次调查样本文化程度分布相对于2004年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民工整体文化程度分布的数据来说,呈现出文化程度大大提高的趋势。这个百分比

¹³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第71-72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4月

数据是否合理可靠？这还有待更大规模的调查来检验。但不容置疑的是，这反应了农民工文化程度构成的一个新趋势：文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农民工的这种新的文化程度构成必将影响到农民工的语言状况。

6. 收入

表格 7 调查样本收入分布表 (N=164)

	1000 以下	1000-1500	1500-2000	2000-2500	2500-3000	3000 以上
样本数 (人)	25	44	36	22	13	24
所占比率 (%)	15.24	26.83	44.88	13.41	7.93	14.63

【收入单位：(人民币)元】

从本次调查样本收入分布来看，占比最多的是月收入 1500-2000 元，占 44.88%，其次是 1000-1500 元，占 26.83%，两者相加占 71.71%。意外的是，月收入 3000 元以上的竟占到了 14.63%。在 2004 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调查中，在地级市、县级市和建制镇务工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分别是 752 元、740 元和 739 元¹⁴，显然本次调查样本的收入数据高出 2004 年调查数据很多。原因如下：一、和调查时间有关，两次调查时间相隔六七年，其间全国工资收入都在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也在大幅提高；二、和调查对象有关，本次调查样本中学历偏高，还有部分调查对象是在北京、上海等收入较高的一线城市打工。

7. 从事行业

表格 8 调查样本行业分布表 (N=164)

	制造业	建筑业	社会服务业	家庭服务业	其他行业
样本数 (人)	29	30	57	5	36
所占比率 (%)	17.68	18.29	34.76	3.05	21.95

因为本次调查的内容主要是语言状况，所以根据需要，我们对农民工的行业进行了重新分类，即分为制造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住宿餐饮、交通运输、商业等）、家庭服务业（保姆、家装人员等）、其他行业五种。从调查样本行业分布来看，最多的是社会服务业，占 34.76%；第二是建筑业，占 18.29%；第三是制造业，占 17.68%。这个数据与农民工整体情况的数据也有一些出入。我们

¹⁴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第 105 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 4 月

可以对比的数据有两个：一、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农民工在制造业就业的占30.3%，在建筑业就业的占22.9%，在社会服务业就业的占10.4%，在住宿餐饮业就业的占6.7%，在批发零售业就业的占4.6%。”¹⁵ 我们如果按本次调查的分类重新计算2004年农民工整体行业的分布就是社会服务业（含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占21.7%。二、2005年劳动保障部的快速调查，农民工在“制造业占27%，建筑业占26%，住宿和餐饮业占11%，批发和零售业占12%，居民服务业占9%，其他行业占15%。”¹⁶ 按本次调查的分类，社会服务业（含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占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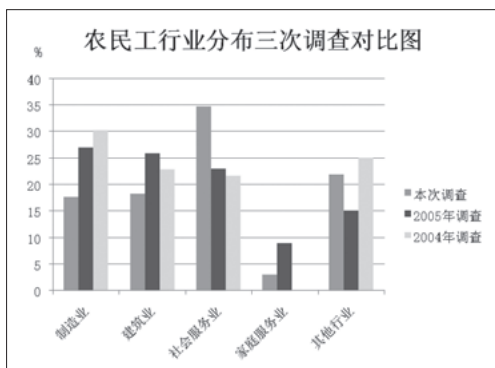
比较三次调查数据如下：

表格9 本次调查与2004年、2005年调查农民工行业分布比较表

	制造业	建筑业	社会服务业	家庭服务业	其他行业
本次调查（%）	17.68	18.29	34.76	3.05	21.95
2005年调查（%）	27	26	23	9	15
2004年调查（%）	30.3	22.9	21.7	—	25.1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绘制三次调查的对比图如下：

图表1



显然，本次调查样本在制造业、建筑业的分布低于2004年、2005年调查的

¹⁵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第5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4月

¹⁶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第76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4月

比率，而服务业（含社会服务业和家庭服务业）的分布却高于 2004 年、2005 年调查的比率，这正反映了近年农民工行业分布的一种新变化：服务业从业人员大幅增加。

8. 输出地

表格 10 调查样本输出地分布表（N=164）

	样本数（人）	所占比率（%）
山东省	38	23.17
安徽省	37	22.56
江苏省	35	21.34
黑龙江省	11	6.71
河北省	8	4.88
重庆市	7	4.27
江西省	7	4.27
云南省	6	3.66
河南省	4	2.44
四川省	3	1.83
甘肃省	2	1.22
湖南省	2	1.22
湖北省	1	0.61
吉林省	1	0.61
天津市	1	0.61
上海市	1	0.61

从本次调查样本输出地分布来看，遍及 16 个省市，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居于前三位的山东（23.17%）、安徽（22.56%）、江苏（21.34%）之中只有安徽属于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大省（输出地为山东、江苏两省的农民工大多是省内移动），但样本中还有属于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大省的中西部地区的省市如江西、重庆、云南、河南、四川、甘肃、湖南、湖北等地共 32 人，占比 19.51%，另有来自黑龙江、吉林和河北的若干，所以本次调查样本的输出地分布基本是合理的。

9. 打工地

关于打工地这一选项，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作答，不便统计百分比。但从作答的情况统计来看，样本中居于前列的省市分别是：江苏、山东、北京、浙江、上海、安徽。打工城市既有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也有二线城市南京、杭州、青岛等，既有发达地区的温州、苏州、无锡等，也有欠发达地区的安徽黄山

市、江西南昌市、山东泰安等。整体来看，打工地的分布还是比较全面均衡、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总之，从前面关于调查样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打工年限、文化程度、从事行业、收入、输出地、打工地（输入地）各方面情况的分析来看，本次调查样本的情况基本上符合农民工整体的特点，个别出入较大的地方，都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整体的情况实际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本次调查的样本分布是合理的。这是我们后续分析的基础。

三、调查结果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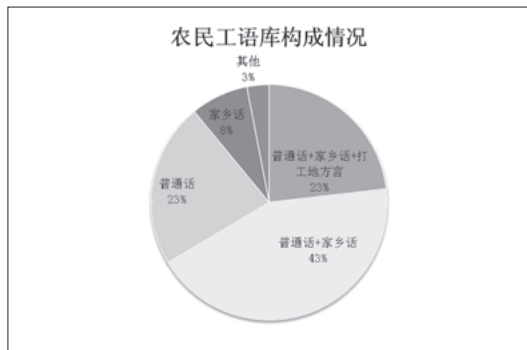
（一）农民工的语言能力

本次调查中调查的农民工的语言能力包括这样几个方面：语库构成、普通话水平、拼音掌握情况、外语水平。

1. 语库构成

在回答“您现在能用那些话（语言）与人交谈？（最多选三种）”时，同时选普通话、家乡话和打工地方言的有 38 人，占 23%；同时选普通话和家乡话的有 71 人，占 43%；单选普通话的有 37 人，占 23%；单选家乡话的 11 人，占 8%；其他 5 人（含普通话 + 打工地方言 1 人，普通话 + 英语 2 人，家乡话 + 打

图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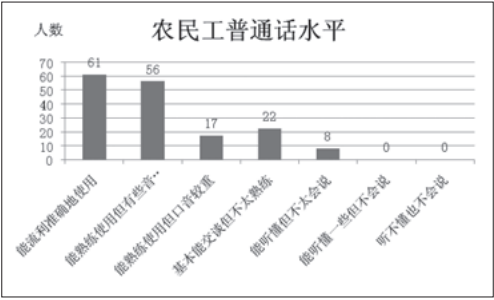
工地方言 2 人)，占 3%。具体情况见下图：

除去单选普通话和单选家乡话的，选择其他几种情况的农民工都是具备两种以上语言交流能力的多语人，其语库构成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两种以上的语言，这种人合计占 69%，可见农民工的语库构成整体呈现出一种多语化的倾向。其中占比最多的是同时掌握普通话和家乡话的人，占 43%；而同时掌握普通话、家乡话和打工地方言的人是农民工中语言交流能力最强的人，也是适应城市生活能力最强的人，这种人占到了 23%。

2. 普通话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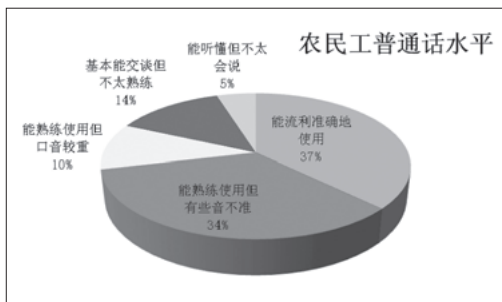
为了调查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我们参照“2000 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调查问卷，将普通话水平分成 7 挡：1. 能流利准确地使用；2. 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3. 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4. 基本能交谈但不太熟练；5. 能听懂但不太会说；6. 能听懂一些但不会说；7. 听不懂也不会说。调查结果如下：选 1 的 61 人，占 37%；选 2 的 56 人，占 34%；选 3 的 17 人，占 10%；选 4 的 22 人，占 14%；选 5 的 8 人，占 5%；选 6 和选 7 的都是 0 人，占 0%。具体如下：

图表 3



因为选 6 和 7 两种情况的人都为 0，所以实际上前五档的合计就为 100%，我们把前五档的百分比情况图示如下：

图表 4



从调查结果看，普通话水平为一档“能流利准确地使用”和二档“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的两种情况合计占 71%，是大多数，而六档和七档的人均为零。也就是说，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选择一档的人如此之多有点出人意料，这个结果和人们一般认为农民工普通话水平较低的认识有些出入。导致这种结果产生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我们的调查是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普通话程度的评估完全靠测试对象的自报，是一种主观评价，而测试对象因为对普通话代表较高社会地位认识的认同，在自报时会不自觉地产生高报的情况；二、农民工整体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他们对于普通话语音词汇语法的标准不是很了解，也就是说农民工自认的“能流利准确地使用”的主观标准和普通话专家的客观标准是有很远距离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出现了对于农民工普通话程度的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不一致的情况。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自报为一档的人其实普通话语音相当不标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承认，大部分的农具有较好的普通话交流能力，其普通话水平也远远高出农村一般人群的平均值（2000 年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的普通话人口比例为 45.06%。2010 年，河北、江苏、广西会普通话的乡村人口比例分别提升到 69.13%、63.13% 和 78.31%¹⁷）。而且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增长，其普通话水平也呈现出正增长。另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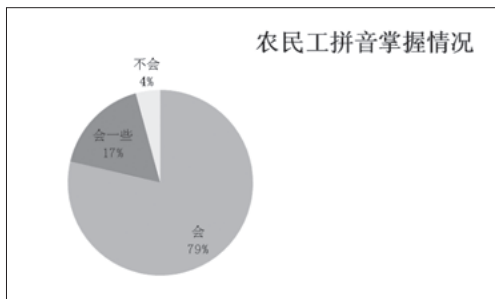
¹⁷ 谢俊英 2011《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语言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 3 期

随着年纪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生代农民工¹⁸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比率越来越高,农民工整体的普通话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3. 拼音掌握情况

在回答“你会不会汉语拼音?”的问题时,回答“会”的有129人,占79%;回答“会一些”的有28人,占17%;回答“不会”的只有7人,占4%。也就是说,农民工对拼音的掌握程度基本上还是令人满意的。具体情况图示如下:

图表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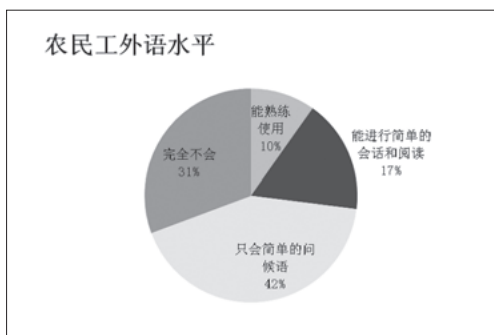


从上可知,会拼音的人占了农民工的绝大多数。但是问卷中的“会”指称模糊,“会”的程度不明确,“会”的熟练度和精准度不确定,所以我们无法从调查结果知道农民工掌握拼音的详细情况,这只能依赖另外的针对性的专门调查,但通过调查中的参与观察,我们了解到很多农民工因为受方言影响在使用拼音时不很熟练流畅。

¹⁸ “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龄在16-30岁之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

4. 外语水平

图表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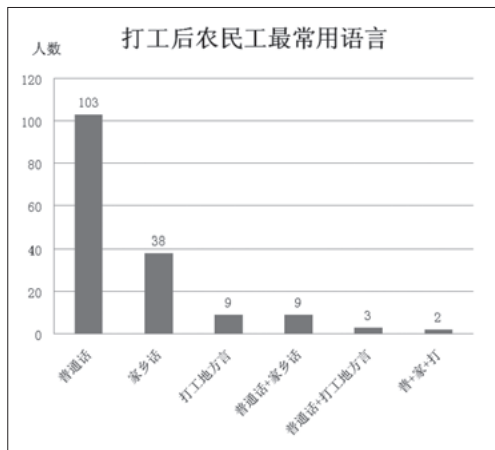
农民工的外语水平普遍比较低，能熟练使用的只有 16 人，占 10%；能进行简单的会话和阅读的有 28 人，占 17%；只会简单的问候语的有 69 人，占 42%；完全不会的有 50 人，占 31%。其中后两种情况合计占 73%，也就是说“只会简单问候语”和“完全不会”的人是大多数，所以说农民工整体的外语水平很低。相对于其他语言能力来说，农民工的外语水平是最低的。

综上所述，农民工的语言能力的特点为：语库构成不单一，大多有两种以上的语言（方言），农民工大多具有多语能力，能同时熟练运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方言）；农民工大多具备较好的普通话交流能力，但也有个别人的普通话交流能力较弱；农民工大多具备使用拼音的能力，完全不会的只是极个别；农民工的外语水平整体较低，绝大多数水平极低。

（二）农民工的语言使用

1. 最常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

图表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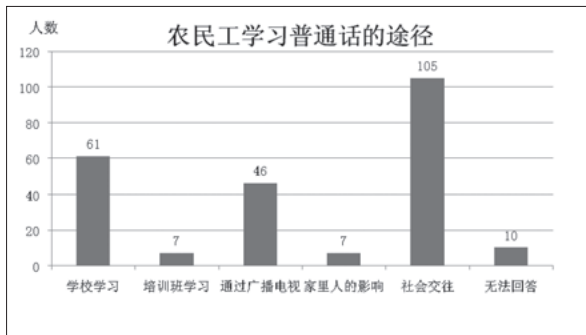
进城后农民工最常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的 103 人,占 63%;是家乡话的 38 人,占 23%;是打工地方言的 9 人,占 5%;另外同时选普通话和家乡话的 9 人,占 5%;同时选普通话和打工地方言的 3 人,占 2%;同时选普通话、家乡话和打工地方言三种的 2 人,占 1%。(虽然设计问卷时的初衷是单选,因为是最常用的语言,答案应该是唯一的,但调查时出现了多选的答案,因此我们认定多选者的几种语言同样常用,不分彼此。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农民工的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从调查数据来看,普通话占据绝对优势,除了单选普通话的 63%,多选答案中也都包含了普通话,因此将几种情况的数据相加得知,常用普通话的比率达到 71%。所以,普通话是农民工进城后最常用的语言,也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与人交流的最重要的语言工具。

2. 主要通过学校学习和社会交往来学说普通话

关于学说普通话的途径,回答“学校学习”的 61 人,回答“培训班学习”7 人,回答“通过电视广播”的 46 人,回答“家里人的影响”的 7 人,回答“社会交往”

的105人,回答“无法回答”的10人。

图表8(多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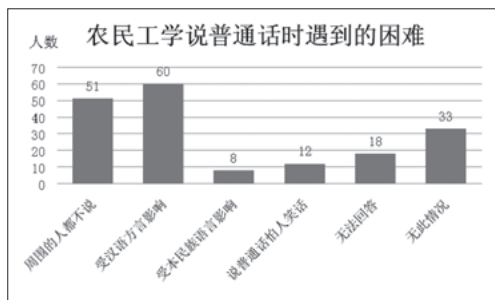
因为这个问题是多选题,无法统计百分比,但从人数来看,居首位的是“社会交往”,其次是“学校学习”,居第三位的是“通过广播电视”。其中,第一位和第二位的都是社会影响,也就是说目前农民工大多是在社会交往中或在接受广播电视节目时被动地、自发地、不系统地学说普通话,而较少通过学校学习、培训班学习来主动地、系统地学说普通话。这个调查结果只能说明农民工学习普通话途径的现状,并不是说“社会交往”就是学习普通话的最有效途径¹⁹,因此我们依然强调应该加强对农民工或农民工预备军(农村青少年)的普通话教育,包括对农村青少年的普通话学校教学和对进城农民工的普通话培训,这可能是最有效的普通话学习方式。

3. 学说普通话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困难

大多数农民工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至于具体困难,回答“周围的人都不说,说的人少”的51人,回答“受汉语方言影响不好改口音”的60人,回答“受本民族语言影响不好改口音”的8人,回答“说普通话怕人笑话”的12人,回答“无法回答”的18人,回答“无此情况”的33人。

¹⁹ 参见付义荣 2012《关于农民工语言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图表 9 (多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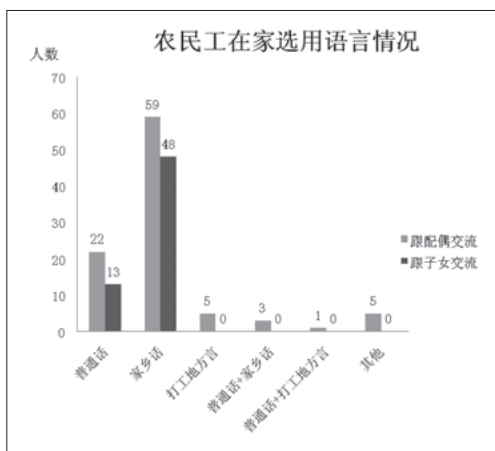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农民工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最大困难就是自身普通话基础不够好(含“受汉语方言影响不好改口音”和“受本民族语言影响不好改口音”),在一些年纪大、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身上这个问题尤其突出;第二大困难就是不具备使用普通话的良好的语言环境(“周围的人都不说”),在一些老乡聚集的建筑工地、工厂和“老乡村”,这个问题比较突出;至于“说普通话怕人笑话”这一问题已经无关紧要,因为选择这一答案的人很少,可见使用普通话已不存在外界的社会舆论压力,尤其是在城市里。值得注意的是,有少部分农民工(33人)认为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时没遇到什么困难,这部分人是普通话基础较好的农民工。经过追踪调查,得知这些人一部分是老家在东北、河北、山东等地,其家乡话与普通话比较接近,因此学习和使用普通话没什么困难;另一部分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包括大中专毕业生和一些寄宿高中生),他们在学校里的常用语言就是普通话,所以他们也觉得学习和使用普通话没什么困难。

4. 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不一致

社会语言学中,有“语域”(register)的概念,语域是指“语言使用的变体”,即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为了表达的需要使用不同的语言变体。(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1997)。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就是适用于不同场合的语言变体。外部语言指公共场合(工作单位、商店、医院等)使用的语言,内部语言指在家庭等私密场合或和关系密切的人交流时使用的语言。本次调查从跟配偶交流和跟子女交流两种情况调查了农民工在家庭中的语言选用情况,即内部语言情况。从调查结

果来看,农民工在家里跟家人交流时多使用家乡话。跟配偶交流时,使用普通话的22人,占23%;使用家乡话的59人,占62%;使用打工地方言的5人,占5%;使用其他语言的5人,占5%;交替使用普通话和家乡话的3人,占3%;交替使用普通话和打工地方言的1人,占1%。跟子女交流时则只有两种情况:使用普通话的13人,占21%;使用家乡话的48人,占79%。两种情况下使用语言的数据比较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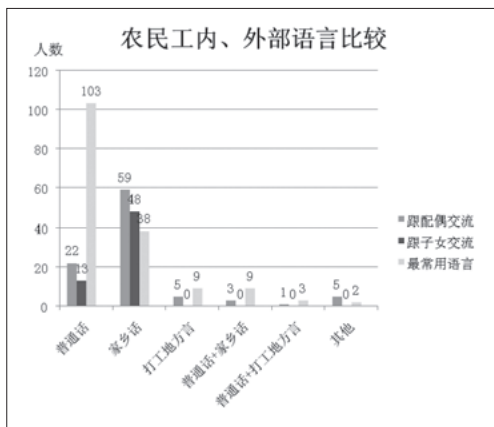
图表 10



比较一下两组数据会发现:后一组数据(跟子女交流)较之前一组(跟配偶交流),无论总数还是使用语言的类型方面都要少一些。总数少,是因为调查对象大多还没有子女,没有作答。使用语言的类型少,是因为农民工子女的语言背景相对比较简单,所以与之交流时使用普通话或家乡话即可,所以选用语言类型只有两种情况;而农民工配偶的背景则复杂一些:配偶是老乡的多使用家乡话(这种情况居多,因为农民工的配偶大多数是老乡),配偶是打工地人的多使用打工地方言,两者都不是的多使用普通话,也有的交替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如普通话+家乡话、普通话+打工地方言),总之跟配偶交流时使用语言的情况比较多样化,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变化。

但是以上两组数据共同的一点是：无论跟配偶还是跟子女交流时，农民工用得最多的语言都是家乡话，家乡话的使用人数远远超出包括普通话在内的其他语言。也就是说农民工在家庭生活中的内部语言以家乡话为主。但是前面的调查告诉我们，农民工进城后最常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占 71%，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外部语言以普通话为主。请看打工后农民工最常用语言和在家语言选用情况对比：

图表 11



从上图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农民工最常用的语言是普通话，其使用人数和所占百分比远远超出其他语言；而在家时，无论是跟配偶交流还是跟子女交流，使用人数和所占百分比居于首位的都是家乡话。所以，大部分农民工的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是不一致的，农民工的语言生活中非常频繁地进行着语码转换——经常性地从城市生活中最便捷有效的外部语言普通话转换为他们感觉最亲切熟练的内部语言家乡话。因此，农民工大多具有较强的多语能力和较强的语码转换能力。基本上只有两类农民工能够保持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的一致，他们分别处于农民工群体的顶层和底层：一类是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都使用普通话，这类人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普通话水平较高，从事管理工作，能很快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而且实际上也已经基本城市化了；一类是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都使用家乡话，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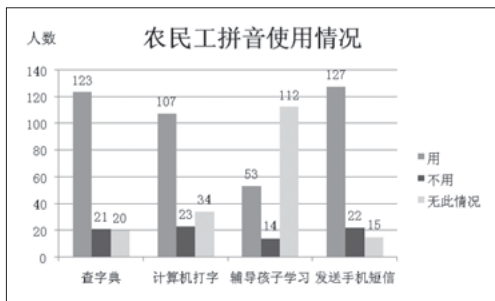
类人大都受教育程度不高,普通话水平较低,从事与外界打交道较少的体力劳动(如建筑工地工人、工厂工人),比较难适应城市生活,容易成为城市中的“孤岛”,实际上他们的城市化程度也不高。

5. 拼音使用较为普遍

因为手机、计算机等现代工具都需要拼音输入,而这些工具(尤其是手机)近些年的普及程度非常高,所以农民工中的拼音使用较为普遍。

农民工拼音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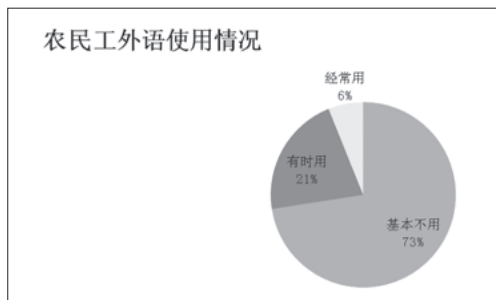
图表 12



总的来说,拼音的使用情况还是不错的:“查字典、计算机打字、发送手机短信”时使用拼音的人都超过了100人,61%以上。只有“辅导孩子学习”时使用拼音的人少一些,那是因为测试对象很多还没有孩子,所以回答“无此情况”的居多。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查字典、计算机打字、发送手机短信这些方面对于提高农民工的拼音水平、提高普通话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人回答的是“无此情况”,也就是说不存在“查字典、计算机打字、发送手机短信”的情况,换句话说这些人的语言生活乃至文化生活处于比较贫乏、闭塞的状态,与现代信息社会脱节,这种人虽然比率不是很高,但依然是应该引起相关方面注意的一个问题。

6. 较少使用外语

图表 13



农民工较少使用外语，经常用的有 10 人，占 6%；有时用的有 35 人，占 21%；基本不用的有 119 人，占 73%。基本不用的是大多数，从目前农民工所处的工作环境及生活环境来看，确实极少需要使用外语，调查中经过追踪访谈得知经常用外语的以餐饮业从业人员为主，也有的是外企员工。

综上所述：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最常用的语言是普通话，同时还会交替使用家乡话，间或用到打工地方言；普通话是公共场合如职场、商场、医院等地方最常使用的外部语言，家乡话是和家人、老乡交流时最常使用的内部语言，打工地方言是和当地人交流时使用，农民工掌握得并不好。农民工常年处于多种语言混杂的语言环境中，具有较强的语码转换能力，可以随时根据交际场合交际对象的变化而转换语言；同时多语环境也带给农民工多种文化的冲突，能否适应城市文化、克服文化冲突带来的心理问题，是农民工面临的挑战。多数农民工能很快地适应语言环境变化，熟练地使用普通话，甚至少部分人在打工前就已经具备普通话交流能力，但多数农民工还是反应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是普通话基础太差，受到家乡话影响不好改口音，而且农民工在学说普通话时主要是通过社会交往和跟广播电视学，较少依靠学校教育和培训班学习等正规学习方式，因此学习效率大打折扣。多数农民工在查字典、计算机打字、发送手机短信时经常使用拼音，这对他们提高普通话水平大有帮助。目前，极少的农民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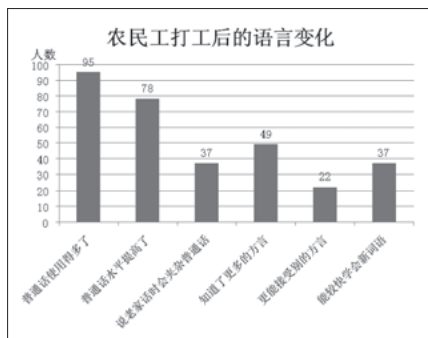
在城市生活中需要使用外语。

（三）农民工打工前后的语言变化

1. 全方位的语言变化

打工前后农民工的生活环境差别很大，从闭塞落后的农村进入繁华的现代都市，交往的人群、接触的语言都有很大的变化。随着语言环境的变化，农民工的语言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回答“普通话使用得多了”的有95人，“普通话水平提高了”的有78人，“说老家话会夹杂一些普通话”的37人，“知道了更多的方言”的49人，“更能接受别的方言”的22人，“能较快学会一些新词语”的有37人。对比情况如下图：

图表 14（多选）



据上可知：第一，位居变化第一、第二位的是“普通话使用得多了”和“普通话水平提高了”，这两种情况远远超出其他选项。也就是说农民工语言进城后变化最大的还是他们的普通话使用情况，无论是使用频率还是普通话水平都大大提高了。普通话使用频率的增加，使农民工的普通话表达能力迅速得到提高，尤其是“说”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从潜在能力变为现实能力，从而使打工前普通话“听”“说”两种能力极度不平衡的状况²⁰得到改变。第二，进城后农民工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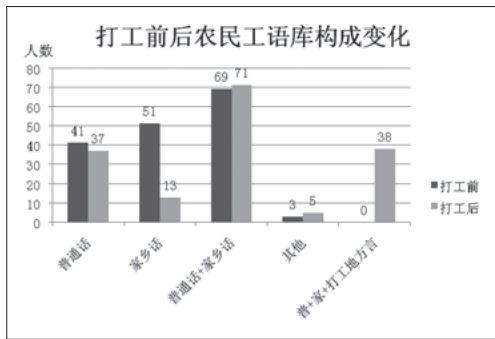
²⁰ 刘玉屏 2010《农民工语言再社会化实证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展了眼界,了解了更多的方言并对别的方言具有更高的接受度,具有一种开放的语言态度——这一点从我们后面关于方言态度的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印证;第三,进城后由于普通话的频繁使用,普通话的语音语法词汇会不自觉地影响农民工的家乡话,引起其家乡话向普通话靠拢,在农民工回乡探亲或回乡定居时又会把这种变化了的家乡话带回老家,对老家的家乡话产生一定的影响,其影响程度、范围和方式有待进一步研究。第四,进城后,农民工能较快地学会新词新语,适应新的语言变化,跟上语言变化的潮流。我们曾就具体的新词语展开调查,结果是农民工对新词语的认知度(包括数量和速度)远远高于普通农民。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调查对象选择了不止一个选项,有的甚至选择了三个、四个选项。也就是说农民工自己也明显地意识到了自己语言的变化,而且意识到这种变化不是单一的、些微的,而是多方面的、巨大的。下面我们从农民工进城前后语库构成、最常用语言两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2. 语库构成的变化

图表 15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农民工打工前后语库构成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打工前没有掌握三种以上语言的人,打工后出现了,就是有了同时掌握普通话、家乡话和打工地方言的人群,而且所占比率不低(23%),甚至有一部分移动打工者因为在多个打工城市生活过,掌握了不止一种打工地方言;二、打工前后,具有多语能力的人增加了,而只具有单一语言能力的人减少了,尤其是只具有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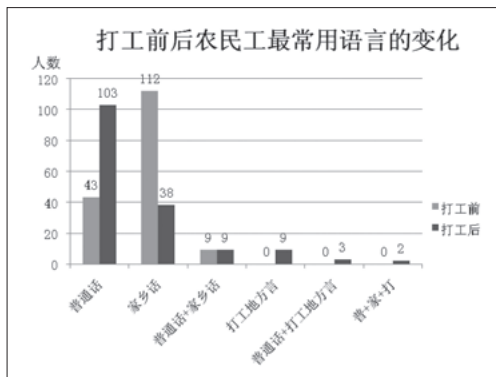
乡话单一语言能力的人大幅减少。总之,打工后农民工的语库构成更加复杂多样。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的调查中,打工前就具有普通话能力的人不少,尤其是同时具备普通话和家乡话能力的人不少。这好像与过去很多资料中关于农民工打工前大多只具有家乡话语言能力的说法不一致。笔者想说的是,农民工打工前只具有家乡话语言能力的说法是一种过时的观点。随着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运动的深入和广播电视前所未有的覆盖率,即使是农村的青少年也具备初步的普通话交流能力,本文前面已经提过,2010年,河北、江苏、广西会普通话的乡村人口比例分别提升到了69.13%、63.13%和78.31%。²¹当然,他们的语音语法词汇可能不太标准(根据笔者调查时的隐蔽观察,这些普通话语音语法词汇不标准的调查对象在接受调查时一般都认为自己具备普通话交流能力)。所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率的提高,农民工整体的受教育程度和语言能力都大大提高,大部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前就已具备普通话交流能力,这也是他们能够大胆走出家门的有利条件之一,或者说因为打工已经成为农村青年最主要的发展途径,很多农村青少年在校学习期间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普通话能力等语言能力的培养。在我们的调查中还出现了一例打工前就已具备家乡话、普通话和外语交流能力的调查对象(接受过大专教育),这当然是农民工中的佼佼者,目前还是属于凤毛麟角的,但它却预示了一种发展趋势: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增加,农民工打工前的语言能力(包括普通话能力和外语能力)将会越来越强。

²¹ 谢俊英 2011《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语言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3. 最常用语言的变化

图表 16



农民工打工前后最常用的语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图中不难看出：一、打工前农民工最常用的语言中具绝对优势的是家乡话，有 112 人，占 68%；打工后农民工最常用的语言中具有绝对优势的是普通话，有 103 人，占 63%；二、打工前农民工最常用的语言限于“家乡话、普通话、普通话 + 家乡话”三种，打工后最常用语言的类型变得多样化，增加了“打工地方言、普通话 + 打工地方言、普通话 + 家乡话 + 打工地方言”等类型。这些新增类型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尤其是以打工地方言为最常用语言的类型很不一般。

综上所述，打工后农民工的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其具体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情况，还是其内在的语言观，都起了很大的变化。从语言能力来说，其语库构成变得复杂多样，由单语人变为多语人，语码转换能力增强，普通话水平大幅提高。从语言使用来说，普通话成为大多数农民工最常用的语言，但也交替使用家乡话和打工地方言，农民工时常需要在多种语码之间进行转换。从语言观来说，变得更加开放时尚，更能接受别的方言，更能接受新词新语等新的语言现象，对普通话的认可度也更高。

四、结语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民工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情况、打工前后的语言变化等语言状况进行了初步的全面分析和描述,但是关于语言态度、影响因素的关联分析、各种不同农民工群体的横向对比研究以及不同时期的纵向对比研究等方面尚未来得及展开,有待于今后继续研究。

参 考 文 献

- [加] 罗纳德·沃德华 2009《社会语言学引论》,雷红波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美] 哈德森 1985《社会语言学》,丁信善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英] 简·爱切生 1997《语言的变化:进步还是退化?》,北京:语文出版社
- Chambers, J. 1995. *Sociolinguistics theory: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Blackwell
- Florian Coulmas 2001《社会语言学通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Labov, William 2001. *Studies in Socio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by William Labov*. BLCU
- Ralph Fasold 2000《社会语言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曹琴 2006《东莞市工业区外来人口语言态度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 陈晨 2012《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建构:语言认同的视角》,《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第3期
- 陈建民 1999《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
- 崔传义 2007《论中国农民工政策范式的转变》,《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戴庆厦等 2004《社会语言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樊中元 2011《农民工语言认同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家》第10期
- 范克新 2004《社会学定量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风笑天 2001《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第二版)》,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付义荣 2012《关于农民工语言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 郭熙 2004《中国社会语言学》(增订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2006《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
- 黄平等 2006《农民工反贫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拉波夫 2001《拉波夫语言学自选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赖涪林 2009《长三角农民工的非稳态转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雷洪波 2008《上海新移民的社会语言学调查》,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李强 2004《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汉林、王琦 2001《关系强度作为一种社区组织方式——农民工研究的新视角》，《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李培林 2004《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力量、夏历 2008《城市农民工用语现状与发展趋势》，《河北学刊》，第28卷第4期
- 刘玉屏 2008《农民工语言行为的社会文化解读》，《修辞学习》第3期
- 刘玉屏 2010《农民工语言再社会化实证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 沈立人 2005《中国农民工》，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盛林、沈楠 2012《农民工子女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及启示》，《南京社会科学》第11期
- 屠国平 2008《宁波市外来人口语言生活状况考察》，《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王春光 2010《制度与机会所有权——有关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流动的考察》，《中国研究》总第7-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玲 2010《农民工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的关系及机制分析》，《北华大学学报》第3期
- 吴增基等 1998《现代社会调查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夏历 2010《东北地区农民工语言状况调查研究》，《北华大学学报》第3期
- 夏历 2007a《农民工语言社区探索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夏历 2007b《在京农民工语言状况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论文
- 夏历 2009《城市农民工的语言资源和语言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 夏历 2012《城市农民工语言态度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 夏历、力量 2007《城市农民工语言学习研究》，《修辞学习》第5期
- 夏历、谢俊英 2007《农民工的语言状况》，《长江学术》第3期
- 谢俊英 2006《进城务工人员语言状况调查与分析》，《语言规划理论与实践》，语文出版社
- 谢俊英 2011《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语言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 谢晓明 2006《关注农民工的语言生活状况》，《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
- 徐大明 2004《当代社会语言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 1997《中国社会语言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端和 2007《语言研究应用 SPSS 软件实例大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曾小洁 2011《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能力缺失与补偿》，《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第4期
- 真田信治等 2002《社会语言学概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6《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北京：语文出版社
- 周庆华 1996《农民工在城市内交往局限性探析》，《城市问题》第4期
- 朱力 2002《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第6期
- 朱力 2001《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摩擦性互动》，《江海学刊》第6期
- 朱考金 2003《城市农民工心理研究——对南京市610名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青年研究》第6期

邹农俭等 2009《江苏农民工调查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文写作获松山大学“2012 年特别研究助成”资助，谨致谢忱！）